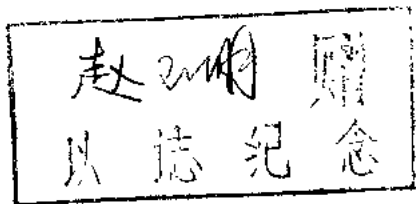


华南新聞事业史料

第一輯

暨南大学新闻系编

一九八〇年春



前 言

我国新闻事业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收集新闻事业的历史资料，总结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这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指导今天为实现“四化”过程中的新闻教学研究和实践，都是很有意义的。为此，新闻系七八届部分同学和老师去年在学习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同时，深入社会调查、采访，在许多新闻界老前辈的热情赞助和指导下，收集和整理了这十四篇文章，汇编为《华南新闻事业史料》第一辑。

诚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上有些新闻事业史料残缺不全，相信在介绍一些报刊时可能会出现不够全面、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我们衷心地希望同志们给予批评指正，并推荐有关的新闻史料，共同把这项工作搞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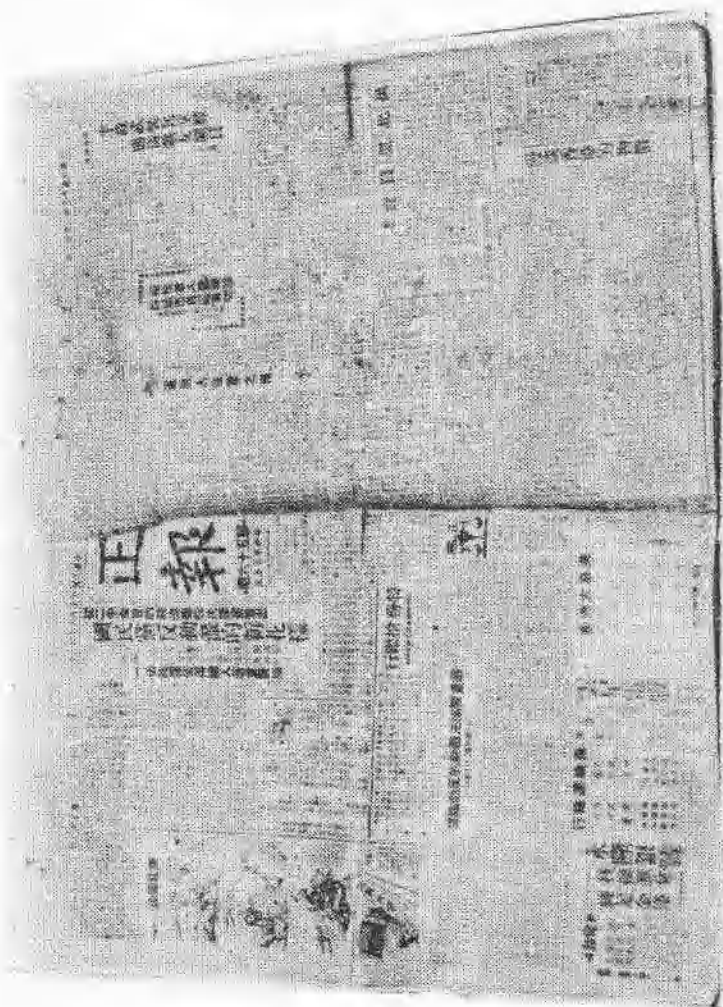


华南大学新闻系
中国新闻事业史教研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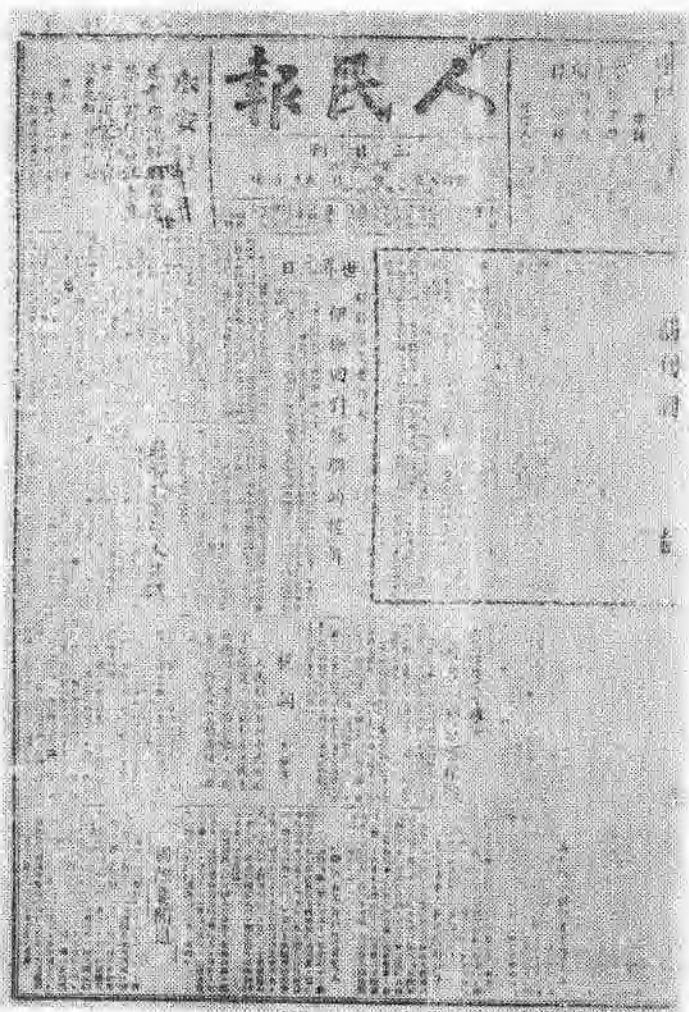
一九八〇年四月



《华商报》是香港的爱国进步报纸。



《正报》是中共广东区委在香港出版的党报。



《人民报》是农工民主党主办的报纸。

先為祖保 鋒民國衛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印刷文字，可能是赠书或题词的说明）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印刷文字，可能是日期或署名）

韬奋同志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为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从香港抢救到东江游击区，这是他写给曾生同志的遗墨。梁卫祖国为氏先锋。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领导爱国青年，组织游击队保卫祖国，驻军东江，籍从文化游击队自港转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奋，敬书此奉赠，藉志谢忱。

韬 奋 一九四二年一月廿日晨

香港《华商报》的战斗历程

麦若素 讲

韩松 记录整理

一、《华商报》的性质

《华商报》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出版的一家爱国、进步的报纸，是我国华南地区爱国进步报纸的中坚力量。既然是份进步的报纸，为什么不起来个“激流”、“浪花”之类的名字，而称为《华商》呢？这正说明《华商报》之所以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所在。

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香港是以靠商业转口来维持它的经济的，商业资本家是港英政府赖以支持殖民地经济的社会基础。英国当局规定，凡出版报纸刊物，一定要有一位有社会地位的人负责。这个人称为“法人”（corporation），否则，就不给予注册。《华商报》第一位法人是邓文田。随后，邓文田因身体不佳，改由他的弟弟邓文剑负责。邓氏兄弟是有一定政治思想觉悟的，爱国的民族资本家，由他们充当法人，可见《华商报》在当地是有广泛的人民性和群众性。

《华商报》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一九四一年四月八日创刊开始至同年十二月十日，即日本军国主义进攻香港的第三天暂时停刊。这一阶段，《华商报》出的是晚报。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商报》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复刊，改为日报。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华商报》在十五日发表社论，宣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向香港同胞告别。这是第二阶段。

前后算来，《华商报》共办了四年多。在这期间，香港斗争异常复杂，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加上报社的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华商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它宣传、教育和动员广大港澳同胞和华南地区进步爱国人士，奔赴抗日救国和民族解放的大业。它不愧是当时的爱国进步报纸的中坚。

第一，它在各个时期都站在和国内反动派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最前列。在《华商报》出现前，香港已有一些民主党派办的报纸，如中国民主同盟办的《光明日报》。它们宣传抗战救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它们的某些政治主张并非完全放在人民利益上，有阶级局限性，对反动派的斗争不够坚决。至于国家社会主义派的张君勱、左舜生之流办的《东方日报》（注：不是目前香港发行的《东方日报》）等，就更加不用说了。《华商报》则不同，它是完全站在抗日救国立场上的，是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因而在任何时候都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

第二，在国际上，它始终站在进步人类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拥护和支持世界各国人民进步的群众运动。

《华商报》创刊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云密布，英、法通过慕尼黑协定，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想利用法西斯的力量反苏

反共。在远东，他们也采取绥靖政策，妄想通过妥协手段，让日本在解决中国问题后把侵略矛头指向苏联。中国共产党及时向人们指出，要警惕有人玩弄“东方慕尼黑”阴谋。

《华商报》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在香港带头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企图牺牲中国的罪行，拥护各国进步的群众运动。

第三，在当地它是港、澳同胞的喉舌，并热情为他们服务。抗日战争胜利时，经过八年离乱的华南地区（包括港澳）人民，迫切要求有个和平、民主的局面，要求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改善人民生活。《华商报》大量反映他们的呼声，报道他们的斗争活动，呼吁社会人士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三年零八个月的世界规模的大战，使寄居海外的华侨中断了和亲人的音讯。战后，许多华侨纷纷来到香港，不少人一登陆便遇上一些不法之徒利用不法手段进行欺骗、讹诈。不少人一踏入家门就受到国民党官僚、特务、兵痞的欺凌压迫，弄得一些华侨倾家荡产，苦不堪言。《华商报》为受害华僑揭露歹徒和国民党匪帮的卑劣行径；甚至冒险派出自己的记者找上一些“大老千”（骗子）的门谈判，为受害者伸冤。它这样说人民要说的话，做人民要它做的事，因而受到华南地区人民的欢迎。

第四，它是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党派、团体组织的舆论阵地。抗日战争发生后，在香港各阶层人民中引起分化，许多爱国的进步的民主人士，迫切需要一个讲话的地方。《华商报》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有人说，你们是在做统战工作，其实，我们谁都没想到要担负统战的任务；问题是大家要求进步，有爱国爱民族的心，要有一份报纸反映他们和他们代表的阶层人民的意见，所以就走到一起来了。

第五，它不是党报，但是它自觉地追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为之宣传鼓动。因此，它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的爱国、民主的进步报纸。正是由于这样，《华商报》争取了大量的读者。复刊后的《华商报》至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前发行数，从来未超过两万份。但是，渡长江后的第二天，发行数突增至十万份左右，当然，看《华商报》的社会影响，从来都不能以它发行的数量来衡量的。由于种种政治上的原因，其发行量是受到局限的，但从实际效果看，它所联系的读者数量是惊人的。那时，出版日期是一个月前的《华商报》，还有人抢着看。报纸残了，破了，还在传阅。有人统计说，一张《华商报》起码有三个把全报读完的读者。至于辗转浏览传阅的，就无法统计了。

《华商报》坚持正确的办报立场，不仅争取到大量的读者，也团结了无数的朋友。比如，陈嘉庚先生的变化便是从看《华商报》开始的。陈先生从来不捐款给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的，但是他读了《华商报》后，认识到《华商报》代表人民利益，就积极帮助《华商报》，并为报纸的复刊题词。许多国民党人员也找《华商报》阅读。当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发动总反攻的时候，不少国民党人员动摇瓦解，投书《华商报》问怎么办？有些国民党的地方军负责人，例如云南省的龙云，就是通过《华商报》找到共产党，最后举行起义的。

二、为什么要办《华商报》？

《华商报》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华南地区要求

有一份正确反映国内外形势的出版物。那时，民族危难深重，中国的命运面临光明与黑暗的抉择。一九三八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军事上节节败退，日本帝国主义打通了粤汉线，广州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游击根据地，组织起抗日民主政权，发动敌后人民用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部分日本侵略力量，弄得日本法西斯军阀疲于奔命。为此，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积极诱降，妄想合伙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不久，汪精卫出走，大批国民党军队改变为汪伪军。蒋介石和日本勾搭。密使来往频繁，炮制“皖南事变”，并且酝酿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国际上，美英则加紧玩弄“东方慕尼黑”阴谋，继续对德、意、日执行绥靖政策。英国封锁滇缅公路，切断了我国的外援通路；美国也加紧运输废钢铁，供应日本制造军火。它们梦想牺牲中国，换取日本法西斯北上反苏反共。正当国家和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华商报》就是在这样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响应党的召唤创办起来的。

当然，《华商报》的诞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民的要求。抗日时期，在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生存权利和民主权利遭到无比凶残的践踏，迫切要求有自己的舆论工具。那时，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捐税多如牛毛。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乘机大发国难财，弄到饥民遍野，饿殍通渠。有一次，我从广州步行到陈村，路长不过二十公里，就看到路旁躺着十三具死尸。即使这样，国民党反动派仍然不顾人民死活，他们还继续制造磨擦，在其势力所及的

地方，千方百计迫害进步民主人士，大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重庆的《新华日报》屡遭特务破坏、封锁；桂林的《救亡日报》被迫停刊。整个国民党统治地区万马齐喑，法西斯反动气焰甚嚣尘上。广大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不忍见神州陆沉，他们要求有自由的舆论阵地来表达自己对祖国命运对旅居地生活的愿望，于是《华商报》就在香港办起来了。

一九四六年复刊的《华商报》和一九四一年创办的《华商报》人员虽然有很大的变更，但是，它作为华南地区爱国进步报纸的中坚，前后是一致的。抗日胜利初期，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忙于接收，搜括民财；另一方面又借助美国力量，迅速部署军队，重新发动内战。把饱受战争苦痛的人民推向饿死的深渊，举国上下怨声载道，记得那时广州市太平南路有一座庆祝抗日胜利的彩楼，人民群众在彩楼下吊着一个“沙锅”，并附有对联曰：抗战八年容易过，和平三月吊沙锅。这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心情的写照。大家原来都盼望早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过上好日子，可是，抗日胜利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却变本加厉。他们在重庆制造校场口血案，在昆明暗杀了闻一多，迫得民主党派人士和进步文化人纷纷出走。这些进步文化人有的到解放区，但更多的人跑到香港。因而《华商报》当时能够集新闻界的精英，如范长江、夏衍、刘思慕、廖沫沙、乔冠华、杜埃、张铁生、高天等同志，以“励时救国”为已任，把报纸办成为表达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政治主张的舆论工具。

三、《华商报》为什么能办得下去

《华商报》坚持民主、进步，为国内外反动派所痛恨；它为什么能在香港生存下来呢？一方面，它是利用了反动派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来自人民，又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表现在《华商报》的版面上，首先是它的报道方针正确。从它的创刊词和复刊词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宣传救国、爱国、民主和民族解放的。在抗战期间，它大量报道全国抗战救国的形势，支持广大人民包括港澳同胞和旅外侨胞的抗日救亡运动，鼓舞人民抗战的必胜信心。抗日胜利后，它宣传爱国、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全国人民掀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三征的民主运动。“三征”即征兵、征粮、征实物。三反的中心是要求民主，在中国建立民主政府来解决人民的生存和出路问题。《华商报》出现后，即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人士，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反对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和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罪恶行径，争取全民族的解放，因而受到各民主党的欢迎。此外，《华商报》还通过大量报道保护当地人民的合法利益。在《华商报》诞生前，香港报纸不少，但是没有积极反映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抗日胜利后，人民普遍要求改善生活，发展生产、恢复社会秩序，可是当时香港的报纸对此不闻不问，或者不敢去管。只有《华商报》重视工人、农民、渔民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把报纸更深地植根于当地人民之中。因此，《华商报》虽已在香港创刊三十年，但是老前辈的港澳爱国人士对它还是念念不忘。

其次，《华商报》是名副其实的来自人民的报纸。尽管国内外反动派对它恨之入骨，必欲消灭它而后快，但国内外

人民却爱它，在精神上物质上支持它。四年多来，它亦无负于人民的期望。

当然，四年多的岁月是不容易渡过的。首先是经济上的困难。《华商报》开办时，港澳各阶层人民热情捐献有几千元，但是，向香港英国当局登记就用去三千元。余下几千块，大家艰苦奋斗，精打细算，便按时出版了。《华商报》复刊时，经济情况稍好一点。当时筹集有六万元资金，买了一部价值二万元的日本人留下的滚筒印刷机，办起简单的排印车间。随着，经一些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的帮助，把在广州订办的《晨报》的铸字机运来；于是，逐步办起了一个略具规模的印刷厂。另一个困难，是国民党反动派和美、英、日特务的迫害。他们殴打报童、恫吓订户和读者，砸烂报摊，给发行带来不少困难。但是，许多爱国报童机智勇敢，坚韧战斗，他们想方设法避过港英和国民党特务，把《华商报》直接送到读者手里。当时香港曾拍摄了一部电影名叫《铁胆》，歌颂《华商报》报童不畏强暴坚持卖报的英雄行为。《华商报》广州发行处也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干扰破坏，他们经常盯梢读者，放黄蜂、毒蛇捣乱，直到凶相毕露，大打出手，于一九四六年“五四”青年节时把这个发行处砸烂。尤其毒辣的办法是经济封锁、制裁。香港英国当局从来不发广告给《华商报》刊登，许多商人也受到特务的恐吓不敢在《华商报》上刊登广告和订阅。港英当局又动辄引用出版法条文来找麻烦，罚款，妄图把《华商报》搞垮。那时，香港新闻记者每月的工资一般为五百元。最初，《华商报》记者月薪二百元，后来遇到困难便降为一百元，最后，只拿生活费，但是，大家不以为苦，反而引以为荣。因

为大家认识到为革命吃苦是光荣的。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对祖国的忠贞，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报纸终于战胜艰难困苦，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使命。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华商报》工作人员撤回到祖国解放了的土地，全部人员朝气蓬勃地投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四、经验与教训

《华商报》在四年多的期间里，冲破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对它的重重压迫，顶住了各种反动舆论对它的进攻，在华南地区的进步报刊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历史证明，它是华南地区人民革命斗争队伍中的一翼，为办好一张报纸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经验和教训都是丰富的。

第一，《华商报》的斗争历史说明一张革命的报纸必须具有人民性。报纸不仅要反映人民的生活要求，更重要的是反映人民的政治要求。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所创造的政治环境，就不可能有人民的和平安定和日益改善的生活。而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又必须由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集中人民的意志来制订。因此，人民性和党性是一致的。报纸自觉地执行党的路线，就是最大限度地体现它的人民性。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以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肆进行原子讹诈，甚至别有用心地连一些商品也加上个“原子”的标签。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报刊都为它呐喊，《华商报》却连一点小篇幅也不给它。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人民受够了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需要休养生息，反对新的战争。当时《华商报》根据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作宣传和发出呼吁。到了一九

四七年，斯大林发表演说声称“我们也有了原子弹”。一九四六年八月，毛主席和斯特朗的谈话发表了。《华商报》便集中揭露美帝的原子讹诈，指出人民的命运要靠人民自己来掌握，戳穿美帝的讹诈政策。这一宣传擦亮了許多人的眼睛。它是斗争的需要，也是人民的要求。相反，如果《华商报》当时也跟着资产阶级报纸起哄，那就违背人民利益了。

第二，报纸要敢于排除干扰，反映真实情况，讲真话。尤其是在海外办报，当地政府的政策法令，充斥市场的代表各阶层观点的报纸，往往给人民的报纸带来说话困难。面对挑战，敢不敢独排众议，坚持求实精神，讲真话，这是对报纸立场、观点和正义感的考验。当然，力排众议，决非一律都排，必须区分“众议”的各种成份，以利于舆论上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集中力量打击和批判少数顽固、僵化的政治思想和观点。同时，力排众议，必须是为了扬真实，说真话，而不是作无原则的争吵。香港《大公报》过去追随蒋介石国民党的政学系，搞小骂大帮忙，我们对它决不能因为可以分化、争取，而不去批评它。倒是更要坚持真理，力排谬妄。后来，配合革命形势发展，我们又做了对方的工作，终于它脱离了政学系，离开了国民党，站在人民这一边来。因而《华商报》全部人员撤离香港时，《华商报》的全部社址和机器就全部转给了《大公报》。

第三，报道上讲时效，讲实效。时效是新闻的特性，实效是报道的目的。这两者都是革命的需要，必须贯彻报道的始终和报纸的各个版面，不可偏废。但必须注意，不能为了追求时效而使报道失实，亦不能为了实效而忽视新闻的时效性。我们必须科学地处理好两者关系。《华商报》是民主人